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三期
2012 年 12 月　頁 167-222

章太炎國故論說中的歷史民族

王　風*

摘　　要

晚清時期進入革命陣營的章太炎（1869-1936），經常分梳他所持的並非「革命」，而是「光復」的理念，其理由與其說是政治的，不如說是文化的。作爲一位大學者，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從事「講學」，也是這個觀念的延伸，在於恢復「衣冠文物」，維繫「歷史民族」的文化命脈。

章太炎的學術體系非常龐大，而漢語言文字是他的首要關注。在他看來，語言文字反映的是文化的盛衰。千年以來，漢語言文字都在衰落之中，而當下又面臨著與西方文化交流的問題。作爲解決方案，他致力於方言的考察，並與死文字相對照，希望以此增加文字量。同時基於歷史的理由，提出獨特的漢語通用語的方案。這是爲了完滿解決「文言合一」與「統一民言」的現實課題。

同時，章太炎試圖爲漢語言文字系統提供完整的理論，以維護其地位。這方面的工作集中在對「假借」和「轉注」的探討，十年之間不斷修改自己的看法，終於得出完美的解釋。在此基礎上，他寫作《文始》，爲全體漢字建立體系。

章太炎的「文學」觀是他的語言文字之學的延伸，本質上是基於

* 作者現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漢字的特點，討論如何正確地運字成文的問題。而當時漢語拼音化的思潮，尤其是採用世界語的主張，都在於取消漢字，這是他的觀念死敵。基於「不齊而齊」的文化觀，他爲漢字進行不遺餘力的辯護，認爲「萬國新語」這種「齊其不齊」的思路正是文明霸權的產物。民族所可以立基的理由，來自於「言文歷史」的認同，他所有的關懷和工作都是服務於此。

關鍵詞：章太炎、語言文字、小學、《新方言》、假借、轉注、《文始》、《齊物論釋》、萬國新語

The Historical Nation in Zhang Taiyan's Argumentations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Wang Feng

Abstract

Zhang Taiyan (章太炎 , 1869-1936), who joined in the Late-Qing revolutionary camp, often declared that what he upheld was not "revolution" but "guangfu" (光復), the motive of which was rather cultural than political. As a great scholar, he invested an amount of energy in his prelection as the extension of this idea to restore the prosperous civilization and to sustain the artery of the culture.

Zhang Taiyan's academic structure is extremely extensive, but with the primary concern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Sinogram, which, from his perspective, reflected the wax and wane of the culture. Since thousands of years ago, Chinese language and Sinograms had been in decline, facing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solution, he devoted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ialects as contrast to the dead Sinograms, hoping to increase the total of Sinograms. At the same time, he brought up the unique project of Chinese lingua franca based on historical accounts in order to find a perfect solution to the practical issue

of matching the writing with the speaking system and the unification of populace languages.

Meanwhile, Zhang Taiyan attempted to provide a complete theory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Sinogram system to maintain its position, focusing on the incessant ten-year exploration of Zhuanzhu (轉 注) and Jiajie (假 借) to have reached the perfect explanation. On this basis, he composed *Wenshi* (《文始》) to build up the system of whole Sinograms.

Zhang Taiyan's concept of "wenxue" (文學) is the extension of his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Sinograms,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o explore how to put Sinograms together to form a sentence according to which features. The contemporary trend of alphabet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specially the notion to apply Esperanto, was his ideological foe in proscribing Sinograms. From the cultural viewpoint "to see the equal in the unequal" (不齊而齊), he spared no effort to defend the Sinograms, for he viewed the train of thought "to equalize the unequal" (齊其不齊) hidden in Esperanto as the product of cultural hegemony. The reason that the nation could lay its foundation was buil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history, which was all his works and his care served.

Keywords: Zhang Taiyan (章 太 炎), Chinese language and Sinograms, xiaoxue (小 學), *xinfangyan* (《新 方 言》), jiajie (假 借), zhuanzhu (轉注), *wenshi* (《文始》), *qiwulunshi* (《齊物論釋》), Esperanto

章太炎國故論說體系中的歷史民族

王　風

一

光緒三十二年（1906）丙午五月初八日（6月29日），在因「蘇報案」繫獄三年後，章太炎出囹圄的當晚即登上赴日本的輪船。孫中山專門派人至滬，迎爲《民報》主筆。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東京留學生開會「歡迎章炳麟枚叔先生」，「至者二千人」。[1]太炎登臺演說，「只就兄弟平生的歷史，與近日辦事的方法，畧講給諸君聽聽」。這場演講標誌著他進入革命派的核心階層，同時也意味著經過多年變化淘洗，在思想與主張上形成了自己的定見。

在「平生的歷史」部分，章太炎自承「瘋癲」「神經病」，而追根溯源，則在於少年時代的閱讀：

> 兄弟少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裡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但兩先生的話，卻沒有甚麼學理。[2]

---

1 民意：〈紀七月十五日歡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民報》第6號，1906年7月25日。

2 以上所引，見太炎：〈演說錄〉，《民報》第6號，1906年7月25日。

民元以前章太炎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爲「民族思想」注入「學理」。而蔣良騏《東華錄》，更是終其一生反覆道及的一部書，被太炎描述成自己的「元閱讀」。1903 年〈獄中答新聞報〉:「自十六、七歲時讀蔣氏《東華錄》、《明季稗史》，見夫揚州、嘉定，戴名世、曾靜之事，仇滿之念固已勃然在胸。」[3] 同年〈致陶亞魂柳亞廬書〉:「鄙人自十四、五時，覽蔣氏《東華錄》，已有逐滿之志。」[4] 其於公開私下場合均不諱言。民國成立後，他仍然不斷回顧，1918 年〈光復軍序〉云:「余年十三、四，始讀蔣氏《東華錄》，見呂留良、曾靜事，悵然不怡，輒言有清代明，甯與張、李也。」[5] 而到晚年，則有更詳細的回憶：

> 余十一、二歲時，外祖朱左卿名有虔，海鹽人。授余讀經。偶讀蔣氏《東華錄》曾靜案，外祖謂:「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余問:「前人有談此語否。」外祖曰:「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爲甚。謂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余曰:「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論，若果李闖得明天下，闖雖不善，其子孫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論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於此。依外祖之言觀之，可見種族革命思想原在漢人心中，惟隱而不顯耳。[6]

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敘述中閱讀蔣氏《東華錄》的年齡也從十六、七

---

3 章太炎:〈獄中答新聞報〉,《蘇報》，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1903 年 7 月 6 日）。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上冊，頁 233。

4 西狩:〈致□□二子書（癸卯四月）〉,《復報》第 5 期，1906 年 10 月 12 日。

5 龔翼星:《光復軍志》，1918 年 8 月天津華新印刷局。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上冊，頁 6。

6 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蹟筆記〉，講錄時間：1936 年 4 月 28 日，《制言》第 25 期，「太炎先生紀念專號」，1936 年 9 月 16 日。

歲逐步降至十一、二歲。或許這是憶往的常態，不足爲異。[7]不過「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則道出章太炎參與革命的基礎立場。所謂「王船山、顧亭林已言之」者，晚清時王夫之《黃書》頗爲流行，太炎外祖所敘當出於此。又《周易外傳・離》:「夏商之授於聖人，賢於周之強國；周之授於強國，賢於漢之姦臣；漢之授於姦臣，賢於唐之盜賊；唐之授於盜賊，賢於宋之夷狄。」[8]至於顧炎武，則《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9]

無論是興中會入會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還是同盟會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孫中山均改寫自朱元璋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其前半部分，所訴諸的都是種族復讎，似乎與章太炎所謂「種族革命思想」並無二致。但孫中山早期文獻，如《民報》〈發刊詞〉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10]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亦即後來所謂〈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中，首次用到漢語詞「中華民國」，[11]其論述重點都在「民國」二字，於世界歷史大勢的格局中，從義理上予以論證。至於「中華」，在孫那兒是不證自明的，並未述及。而一年半後《民報》刊發太炎〈中華民國

---

7 何冠彪注意到這個現象，參見氏著：〈章炳麟與蔣良驥《東華錄》——歷史名人喜好誇大少年事迹一例〉，《明清人物與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 年），頁 183-188。其事固然，惟憶往每爲自證當下，添加枝葉而不自覺，人之常態，與故意僞造取利，判然有別。後人可道出，而不必苛論。

8 王夫之：《周易外傳》，《船山全書》（湖南：嶽麓書社，1988 年），第 1 冊，卷 2，頁 900-901。

9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羣、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中冊，頁 756。

10 孫文：〈發刊詞〉，《民報》第 1 號，1905 年 11 月 26 日。

11 民意：〈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民報》第 10 號，1906 年 12 月 20 日。

解〉，洋洋灑灑：「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爲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爲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12] 其所論者，全在「中華」二字，由古而今，遍及四裔，而於「民國」之「民」究所云何幾不著一字。

此可見於「邦國」，於「種族」，章太炎與孫中山及絕大多數革命黨人的理解，有著很大的不同和側重：

> 故今世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爲限斷，則謂之歷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13]

太炎所關心，簡而言之就在所謂「衣冠文物」，因而本民族歷史與文化的依據是其根本，亦即「歷史民族」其所云者。

普通述及章太炎，總會談到他從維新到革命的變化，約略以1900年〈解辮髮〉〈客帝匡謬〉爲分界。想必在當年就是這樣的評價，因而1903年獄中答記者，他對此做了明確的否定：

> 中歲主《時務報》，與康、梁諸子委蛇，亦嘗言及變法。當是時，固以爲民氣獲伸，則滿洲五百萬人必不能自立於漢土，其言雖與今異，其旨則與今同。昔爲間接之革命，今爲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謂始欲維新，終創革命者哉。

聯繫同文中小時讀蔣氏《東華錄》種種，構成一個具有邏輯脈絡的完整敘事。而接下來的論述，則直接陵轢「維新」、「革命」二語，以爲「惟以維新革命，錙銖相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因而需要「正名」：

> 夫民族主義，熾盛於二十世紀，逆胡羶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吾之

[12] 太炎：〈中華民國解〉，《民報》第15號，1907年7月5日。

[13] 章太炎：重訂本《訄書・序種姓上》，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70。

> 序《革命軍》，以爲革命、光復，名實大異。從俗言之，則曰革命。從吾輩之主義言之，則曰光復。會朝清明，異於湯武，攘除貴族，異於山嶽黨。其爲希臘、意大利之中興則是矣，其爲英、法之革命則猶有小差也。[14]

王夫之《黃書・原極第一》云：「故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於孫子，須於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15]「革」是漢種自己的事情，對於「夷類」，那就不是「革命」而是「光復」了。亦即〈革命軍序〉所謂：「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16] 所以「變法」、「救民」，這些維新或革命的口號皆非根本。所謂「不能變法當革」，所謂「不能救民當革」，章太炎語氣決絕，他的目標，在於「祀夏配天，光復舊物」。[17]

晚清革命黨人大體由三支組成，主要人物籍屬廣東的興中會，籍屬湖南的華興會，以及籍屬浙江的光復會。光復會成立於 1904 年，會名或許就來自章太炎。其後他在不同場合不斷將當時已經通行的「革命」正名爲「光復」，會中同仁想必皆佩服其學問，但似乎也沒人孜孜於其間的分別。

章太炎實踐的是一條獨特的道路，〈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近日辦事的方法」部分，他首先言及：「一切政治、法律、戰術等項，這都是諸君已經研究的，不必提起。」顯然此類形而下的事情，不能入他的法眼。「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至於如何成就「感

---

[14] 以上所引，見章太炎：〈獄中答新聞報〉，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頁 233-234。

[15] 王夫之：《黃書・原極》，《船山全書》，第 12 冊，頁 503。

[16] 章炳麟：〈革命軍序〉，收於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下集，頁 402。

[17] 章太炎：〈獄中答新聞報〉，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頁 234。

情」，則「全在宗教、國粹兩項」。

宗教問題，章太炎選擇的是佛教，以爲可以「勇猛無畏，眾志成城，方才幹得事來」。至於國粹，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其中「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蹟」。[18]

這場演說後五十日，章接任主編的《民報》第7號出版，刊有〈國學講習會序〉，謂「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宣布太炎講學：

> 先生已允爲宣講者：一，中國語言文字製作之源；一，典章制度所以設施之旨趣；一，古來人物事蹟之可爲法式者……且先生治佛學尤精，謂將由佛學易天下。臨講之目，此亦要點。[19]

可見演說中「近日辦事的方法」，馬上要一一實行。而據宋教仁日記，國學講習會規模甚廣，科目繁多，計劃中也非一人施講。[20]但〈國學講習會序〉中所標榜者僅是章太炎，可見自家陣營中已經以他爲旗幟。當時的講學情況已不可知，今所留存者僅是當月出版署名章炳麟的《國學講習會略說》，則確可知太炎是開講了的。《國學講習會略說》收〈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三文很快也在上海《國粹學報》連載，〈論文學〉改題〈文學論略〉，〈論諸子學〉改題〈諸子學略說〉。《國學講習會略說》中還保留著講學的口氣，〈論語言文字之學〉開頭「今日諸君欲知國學」，《國粹學報》本作「今欲知國學」。〈論諸子學〉起首「上來既講文學，今就學說中諸子一類，爲諸君言其概略」，〈諸子學略說〉中刪去。因可知本都是口說的文字據本，其後也只有一半文字入集《國故論衡》，即〈論語言文字之學〉抽取部分改題〈語言緣起說〉，〈文學論略〉刪削爲〈文學總略〉。[21]

---

[18] 以上所引，見太炎：〈演說錄〉，《民報》第6號。

[19] 國學講習會發起人：〈國學講習會序〉，《民報》第7號，1906年9月5日。

[20] 參見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頁214-215。

[21] 章炳麟：《國學講習會略說》（東京：秀光社，1906年）。章絳：〈諸子學略說〉，《國粹學報》第20、21期，1906年9月8日、10月7日；章絳：〈文學論略〉，《國粹學報》第21、22、23期，1906年10月7日、11月6

《國學講習會序》作者不知誰何，中謂：

> 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22]

這段文字的風格頗有梁啓超的氣息，但意思應該來自太炎，也是當年國粹派同志的根本立場。所謂「國學」，本就不僅僅是「學」，其上還有個「國」，「學」是「國」「成立之源泉」。也就是說，光有「學」未必能有其「國」，而無「學」必不能立其「國」。章太炎反覆認眞分辨他所從事的是「光復」而不是「革命」，緣由正在於此：

> 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於憂患者多。自三十九歲亡命日本，提獎光復，未嘗廢學。[23]

「光復」與「學」，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章太炎學術工作的動機，以及他「講學」的目的。1906 年下半年的講學似乎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其後章太炎陷入《民報》以及大量的政治事務中，大概未能「講學」。1908 年 10 月《民報》遭禁，按他自己的說法，又開始講學。《自定年譜》「宣統元年」條：

> 《民報》既被禁，余閒處與諸子講學……煥卿自南洋歸，余方講學，煥卿亦言：「逸仙難與圖事，吾輩主張光復，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會先，曷分設光復會。」余諾之，同盟會人亦有附者。然講學如故。[24]

日、12 月 5 日；章絳：〈論語言文字之學〉，《國粹學報》第 24、25 期，1907 年 1 月 4 日、2 月 2 日。

22 國學講習會發起人：〈國學講習會序〉，《民報》第 7 號。

23 章太炎：《自定年譜》「清稿」本，「宣統二年四十三歲」條，《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上海：上海書店，1986 年），無頁碼。

24 章太炎：《自定年譜》「清稿」本，「宣統元年四十二歲」條，《章太炎先生

太炎不愧文章聖手，此節記同盟會渙散，陶成章擬重建光復會，翌年正月成立時且以章爲會長。但此處追述，僅「余諾之」三字表明態度。在敘述這些政治大事時插入數語，「余閒處與諸子講學」、「余方講學」、「然講學如故」，從文章角度似是以閒筆調理辭氣，變換節奏，實則「講學」乃是敘述主脈，「閒處」、「方」、「然」等，其意態正在這不言而言中。

作爲掌門大弟子，黃侃是可以洞澈乃師肺腑的，多年後，其追敘如此：

> 先生與日本政府訟，數月，卒不得勝，遂退居，教授諸遊學者以國學……思適印度爲浮屠，資斧困絕，不能行。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彌厲。其授人以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百人。可謂獨立不懼，暗然日章，自顧君以來，鮮有倫類者矣。[25]

所述「退居」講學，與章太炎所述一致。不過據朱希祖日記，早在《民報》被禁前半年，神田大成中學的《說文》課已開班。章、黃所記並不準確，但也許不是記憶問題，而是強調與《民報》被禁的因果關係。甚至朱日記中，神田開課前半個多月，還有太炎他處演講的記載，[26] 可知「講學」也許是章在日期間的常態。脫卻《民報》社務，則更可以「謝公社事，專務厲學。徙居小日向臺町二丁目二十六番，署門曰『國學講習會』。雜賓不至，從游者皆素心人」。[27] 黃侃將太炎

自定年譜》，無頁碼。

25 黃季剛：〈太炎先生行事記〉，《神州叢報》第1卷第1冊，1913年8月1日。

26 參見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頁291-294。

27 章炳麟：〈與鍾君論學書〉（1909年1月20日），《文史》，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279-280。「鍾君」即鍾正楙。「謝公社事」語氣節奏不洽，疑爲「謝公杜事」，移寫整理時形近而訛。

擬之爲「顧君」，實則顧亭林曾改名「絳」，又改名「炎武」，而章炳麟亦曾改名「絳」，而號「太炎」。此與康有爲自比孔子之「素王」，而號「長素」。一誠篤，一虛驕，其間不可以道里計也。

太炎奮力講學，「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當時他自然不可能預知清廷何時覆滅，所可以努力的是維繫「學術不絕」，才能有所依俟，以期於「復陽之望」。螢光爝火，守先待後，是爲太炎學術的眞精神。

正因爲身任顧炎武，自以爲文化命脈所繫，當生命受到威脅，章太炎總有無限焦慮。1903 年上海獄中，有〈癸卯□中漫筆〉：

> 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於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跡是踐，豈直保守殘闕而已。又將官其財物，恢明而光大之。懷未得遂，纍於□國，惟□翼□歟，則猶有繼述者。至於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罪也。[28]

語氣似乎誇慢，而拳拳之心，讀之令人動容。1908 年因劉師培與之反目事，他移書孫詒讓，請前輩爲之調停，自言「非爲一身毀譽之故，獨念先漢故言不絕如縷，非有同好，誰與共濟」，所希望於劉師培者，乃是「與麟戮力支持殘局」。詒讓尚未接到函件便已離世。[29] 翌年直接致函劉師培，極言「與君學術素同，蓋乃千載一遇。中以小

---

[28] 章炳麟：〈章太炎癸卯□中漫筆〉，《國粹學報》第 8 期，1905 年 9 月 18 日。「□中」即「獄中」。收於《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一》，題〈癸卯獄中自記〉，其中「纍於□國，惟□翼□歟」作「纍於仇國，惟金火相革歟」，參見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144。

[29] 〈與孫詒讓〉，末署「上五月初三」即 6 月 1 日（本月二十二日即 6 月 20 日，孫詒讓卒），《制言》第 30 期，1936 年 12 月 1 日。據孫延釗〈餘杭先生與先徵君〉，孫詒讓未及收到來信，參見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頁 262。

釁，翦爲仇讎……思君之勤，使人髮白」，[30]痛心疾首，溢於言表，所爲者盡在「國粹日微，賴子提倡」。[31]

辛亥「秋八月，武昌兵起，余時方與諸生講學」，很快「湖南、江西相繼反正」，大局已變，章太炎「始輟講業」。[32]

二

1906年7月章太炎第三度赴日，1911年11月返國。此數年間，概而言之即其自言之「提獎光復，不廢講學」。期間所出版，最早係1906年9月《國學講習會略說》，收〈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三文。最晚係1910年6月《國故論衡》，「分小學、文學、諸子學三類」，《教育今語雜誌》上的廣告，稱「本在學會口說，次爲文辭」。[33]正可見其一以貫之的「講學」，在結構上，基本都是這三支。

因太炎有「語言文字之學」一語，遂被後來的學者賦予現代學術轉型的意義，即與傳統「小學」劃然有別。此說甚是渾淪，實則二語在太炎處通常混用，等而爲一，用「小學」者更爲常見，「語言文字」一般在論述二者關係時使用。〈論語言文字之學〉只在開頭部分言「語言文字之學」，此後俱稱「小學」。不過，不管「語言文字之學」還是「小學」，他確實有不同前人與時人的界定。[34]〈論語言文字

---

30 章太炎：〈再與劉光漢書〉，《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頁157。錢玄同：〈章太炎黃季剛二君關於劉申叔之文十首〉繫於己酉（1909），收於劉師培著，錢玄同主編：《劉申叔遺書》（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3。

31 劉子駿之紹述者：〈某君與某書〉之二，《國粹學報》第24期，1907年1月4日。

32 章太炎：《自定年譜》「清稿」本，「宣統三年四十四歲」條，《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無頁碼。

33 無署名：〈國故論衡廣告〉，見1910年《教育今語雜誌》各期。

34 有關這一問題，較恰切的論述，參見黃錦樹：《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系譜》（永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頁4-7。

之學〉云：

> 此語言文字之學，古稱小學……今日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爲經學之附屬品。實則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而已。周秦諸子史記漢書之屬，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學者必不能讀。若欲專求文學，更非小學不可……如上所說，則小學者，非爲通經之學，而爲一切學問之單位之學。

有清一代，樸學大師輩出，其中「小學」一門，早已由附庸蔚爲大國。但在一般觀念上，「小學」確爲通經之用。而在章太炎那兒，正如孔子並不居於特殊的「教主」之席，《語》、《孟》應回歸諸子之部列一樣，經部誠如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史」，也不具有特出的典籍地位。「小學」是一切學術的基礎，因而「今日諸君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

「所謂小學，其義云何，曰字之形體、音聲、訓詁而已。」太炎如此界說，實在平平無奇。不過對於諸多清儒名著，他認爲僅可稱「說文之學」「爾雅方言之學」「古韻唐韻之學」，而「不得稱爲小學」，只有像戴東原以下如段、王、郝，能夠「兼此三者，得其條貫」，才當得起其心目中的「語言文字之學」。[35]

章太炎所謂「語言文字之學」或「小學」，有遠超乎前賢的關懷。《國故論衡》開卷首篇之〈小學略說〉，是章的綱領性文件，其言曰：

> ……凡治小學者，非專辨章形體，要於推尋故言，得其經脈……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劃篆，繳繞文字而已……。[36]

---

[35] 以上所引，見章炳麟：〈論語言文字之學〉，《國學講習會略說》，頁1-6。

[36] 章炳麟：〈小學略說〉，《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大共和日報館，1912年），上卷，頁4。

太炎之前，「小學」本是「通經」的工具。太炎之後，一般人的觀念，誠如吳稚暉所言，「語言文字之爲用，無他，供人與人相互者也」。[37] 但對於章太炎來說，「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從國故到民俗，負載著古今上下的文化。而且，「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於傳記者已寡，惟文字、語言間留其痕跡，此與地中僵石爲無形之二種大史」。[38] 這豈是「器具」而止，簡直就是中華文明的本體。

太炎所處之世，李鴻章所謂「三千餘年一大變局」，危機遍及所有方面。精英階層的應對方案，也是人言言殊。具體到語言文字層面，則有拼音化、白話文的改革思路，此有增廣民智、普及教育等思考背景。而現實的局面，由於西方文明大量湧入，已有語言文字不敷使用，造新字、用新詞已到疲於奔命的局面。二十世紀伊始，以梁啓超爲代表，大量移用日本漢語詞，文章也染上日本風，影響所及，已成風氣。太炎自幼「泛覽典文」，及壯以光復爲使命。在他眼裡，文化命脈所繫，首要在於語言文字，而這也是危機根本所在。時下局面，諸多改革方案，無論拼音化還是日語詞等等，皆無異飲鴆止渴。

早在初刻本《訄書・訂文》，章太炎就闡述了他的判斷。從史籀到許愼，文字「九千名」，而「自《玉篇》以逮《集韻》，不損二萬字」。但北宋以降，各項所用，「千名」至「四千名」而足，「其他則視以爲腐木敗革也已矣」。相對的，「今英語最數，無慮六萬言。言各成義，不相陵越。東西之有書契，莫緐是者，故足以表西海」。[39]

當然，此說有個問題，漢字的「名」即「字」，與英語的「言」即 “word”，並不是可以直接比較的概念。太炎也不是不懂這一點，〈訂文〉附錄〈正名略例〉中就專有一條論及此：

---

[37] 燃料：〈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新世紀》第57號，1908年7月25日。

[38] 章太炎：〈致吳君遂書〉（1902年8月8日），收於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頁172。

[39] 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45-46。

> 西方以數聲成言，乃爲一字，震旦則否。然釋故、釋言而外，復有釋訓。非聯緜兩字，即以雙聲疊韻成語，此異於單舉者。又若事物名號，合用數言……是皆兩義和合，並爲一稱。苟自西方言之，亦何異一字邪。今通俗所用，雖廑跂二千，其不至甚憂困匱者，固賴此轉移爾。由是言之，施於檄移，亦逾萬字。然於理財正辭，其憂不逮甚矣。若有創作，用纘舊文，故一字訓數字兩端，皆稱一字。是則書童竹笘，數必盈億矣。[40]

此處「字」的界說，擴張成相當於如今的「詞」。但即便如此，他認爲也只是滿足「通俗所用」，至於「理財正辭」，則遠遠不夠。而現實狀況中「以二千名與夫六萬言者相角」，簡直是最大的民族危機，「烏乎，此夫中國之所以日削也」。因爲「於文字之盈欠，則卜其世之盛衰矣」，再也沒有比這更形象地反映出當下國家的衰敗。作爲應對之策，〈訂文〉云：

> 先師荀子曰，後王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孟晉之後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舉者，循而摭之。故無其名，今匱於用者，則自我作之。[41]

此即「創作」與「用纘舊文」的兩項方針。待到《訄書》重訂本，〈訂文〉所附，則雜入1902年〈文學說例〉內容，改名〈正名雜義〉。其最後部分所提及，「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於文辭，曰見在語、國民語、箸名語，是爲善用法。反之亦有三種，曰廢棄語、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今亡佚者，曰廢棄語。外來語、新造語，施於文辭，是爲不善用法。』」對三種「不善用法」，武島認爲外來語、新造語有時非用不可，但須節制。而廢棄語，「世人或取丘墓死語，彊令蘇生，語

---

40 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正名略例》，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47-48。

41 以上所引，見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44-46。

既久廢，人所不曉，輒令神味減失」。對此，太炎同意「官號地望」、「械器輿服」必用今名，即「有作於新名」者。至於廢棄語，他則以爲「頃歲或需新造，尋檢蒼雅，則廢語多有可用爲新語者」。此其所謂「有循於舊名」，同樣是應對當下詞語需求的策略，而更爲章太炎所尤其關注，也是他獨有的思考和主張：

> ……若其雅俗稱名，新故雜用，是寧有厲禁邪。至云人所不曉，致減神味，說尤鄙俴。夫廢棄之語，固有施於文辭，則爲間見，行於繇諺，反爲達稱者矣……此並曠絕千年，或數百稔，不見於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尚人人能言之……故文辭則千年曠絕，繇諺則百姓與能……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散在全部之國民，何爲其惛懣減味也。繇是以言，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42]

也就是說，「廢棄語」只是不存於文人筆箚，卻爲民間所慣用，文人筆下的死文字，在國民口中是活語言。因而「雅俗」、「新故」可以並存，千年之久，萬里之廣，俱可統爲一體，這是他解決文之「日以喦媮」的方案。[43]

時隔數年，太炎東渡日本後，開始有機會將這一觀念轉化爲學術工作。1906 年在致劉師培函中，他談到這個想法：

> 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里語，作今方言……僕所志獨在中國本部，鄉土異語，足以見古字古言者不少……比類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楊子，輯爲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吾儕於此，猶能致力，亦有意乎。[44]

---

[42] 以上所引，見章太炎：重訂本《訄書・訂文・正名雜義》，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 227-229。

[43] 參見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漢字統一」與「萬國新語」——章太炎關於語言文字問題的論爭（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67-73。

[44] 章太炎：〈丙午與劉光漢書〉，《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二》，收於上海人民

漢語方言，尤其南方方言中，遺存上古、中古漢語的音義，這是人所皆知的事實。不過，當初揚雄《方言》全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其志誠如許愼《說文解字・丌部》，「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目的在於「采覽異言，以爲奏籍」。[45] 後世所作，大體也是「采風」的餘脈。而章太炎所設想，「上通故訓，下諧時俗」，則是眞正的「禮失求諸野」了。

一年後，《民報》刊出〈博徵海內方言告白〉，曰：「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46] 這裡所揭櫫的目標是當時盛行的「文言合一」，章太炎爲此提供一個他自己的方案。

晚清所謂言文合一，白話文與拼音化主張者，都以此作爲理論支撐。白話文相對文言文更接近現代口語，有著言文一致的基礎，不過，其對接的傳統是以白話小說爲主的傳統書寫語言。眞正接近當下口語的是白話報，但顯然因過於簡單，很難支援新書寫語言的建設，況且還有方言的歧異。拼音化則是以取消漢字爲目標，直接拼寫口語，雖然可以言文一致，但由於各地方言差異，直接導致漢語書寫的分裂。至二十世紀初，又有統一語言的口號，不過如此先須推行通用語，那麼以拼音化實現言文一致的便捷性也就談不上了。[47]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是爲章太炎撰輯《新方言》徵集資料，《新方言》成書，書末劉師培和黃侃的「後序」，季剛言：「儻令殊語

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頁156。

45 劉光漢：《新方言・後序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33。語出郭璞〈方言序〉：「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跡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

46 無署名：〈博徵海內方言告白〉，自《民報》第17號（1907年10月25日）起，基本每期都有刊載。

47 參見王風：〈晚清拼音化與白話文催發的國語思潮〉，收於夏曉虹、王風等：《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20-45。

皆明，聲氣無閡。鄉曲相鄙之見，由之以息。文言一致之眞，庶幾可睹。芳澤所披，於是遠矣。」[48] 申叔言：「夫言以足志，音以審言，音明則言通，言通則志達。異日統一民言，以縣群眾，其將有取於斯。」[49] 一個說「文言一致」，一個說「統一民言」，似乎商量好了替太炎道出心志。普通憑印象認爲章太炎「復古」、「保守」、「反對白話」等等，其實都是皮毛之見。恰恰相反，他的學術工作，正是爲了解決「文言一致」與「統一民言」之類當下的文化問題。「今夫種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辭異同爲大齊」。[50] 只不過太炎的「路線圖」與眾不同，其所謀者大，計畫也浩繁得無邊無際。

《新方言》1907 年 10 月在《國粹學報》連載，1909 年 8 月成書出版。從書名看，是繼武子雲的方言學之作；不過從方法上看，以古語證今語，以今語通古語，可看作語源學著作。「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今於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於冠帶之倫，何有於問學乎。」在他看來，「蓋有誦讀占畢之聲既用唐韻，俗語猶不違古音者；有通語既用今音，一鄉一州猶不違唐韻者；有數字同從一聲，唐韻以來一字轉變，餘字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古音」早於「唐韻」，「唐韻」早於「今音」，因而所謂「俗語」，相對於「通語」和「誦讀占畢之聲」，更可以說是「雅言」。於此動人的存在，章太炎幾於情不能自已：

> ……後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時，爲之理解，猶愈於放失已……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既陟升於皇之赫戲，案以臨瞻故國，其惻愴可

---

48 黃侃：《新方言・後序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頁 135。

49 劉光漢：《新方言・後序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頁 134。

50 章太炎：重訂本《訄書・方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 204。

知也。[51]

其對「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滿懷深情，而「臨瞻故國」的「惻愴」，劉師培則爲之疏解：

> 抑自東晉以還，胡羯氐羌，入宅中夏，河淮南北，間雜夷音。重以蒙古、建州之亂，風俗頹替，虜語橫行。而委巷之談，婦孺之語，轉能保故言而不失，此則夏聲之僅存者。昔歐洲希意諸國，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勳，蘧蒢於此。今諸華夷禍與希意同，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爲嚆矢。此則太炎之志也。[52]

「思古」乃爲了「光復」，這始終是章太炎學術的最原始動力。因而「國故」固然是學術，但更重要的是其指引向「故國」，維繫人民的記憶，使其保持原有的根本，不被同化，亦即所謂「國性」：

> 小學故訓萌芽財二百年……其以披析墳典，若導大窾。次即董理方言，令民葆愛舊貫，無忘故常，國雖苓落，必有與立。蓋聞義大利之興也，在習羅馬古文，七八百歲而後建國。然則光復舊物，豈旦莫事哉。在使國性不醨，後人收其效耳。[53]

「小學故訓」的重要，以及「董理方言」的現實關懷，可謂寄意遙深。「光復舊物」並非「旦莫事」，太炎當年是以爲自己看不到的。因而對於學術工作，他期以長遠，努力維持「舊貫」「故常」，只要「國性不醨」，則總會有一天「後人收其效耳」。

1907 年，日本有「漢字統一會」之設，並將端方、張之洞兩位

---

[51] 以上所引，見章太炎：《新方言・新方言序》，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頁3-5。

[52] 劉光漢：《新方言・後序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頁134-135。

[53] 章炳麟：〈與鍾君論學書〉，《文史》，第2輯，頁280。

極具勢力，並且有相當文化影響的封疆大吏拉進去掛名。這個組織「反對羅甸字母，且欲聯合亞東三國」，亦即中日韓，共同維護漢字地位。這大概即今時髦所稱「漢字文化圈」第一次共同的文化行動，但其策略之一是「選擇常用之字以爲程限」。[54] 這個思路其實並不奇怪，而且延續至今。「漢字統一會」未必是始作俑者，但也是最早試圖使其成爲多國共同政策的。對於章太炎來說，這顯然是個問題嚴重的方案，他素所憂心「暖暖以二千名與夫六萬言者相角」，並全力爲此工作以求解決辦法，《新方言》的一個重大目的即在於此。「夫語言文字之繁簡，從於社會質文」，[55] 而「漢字統一會」卻「以限制文字爲漢字統一之途」，完全南轅北轍，國內居然有勢力者支持。於是，在上海的《國粹學報》開始連載《新方言》的同時，東京《民報》上刊登章的〈漢字統一會之荒陋〉。

在這篇文章中，太炎談到漢字對於日本和對於中國完全不同，在中國「聲音訓詁，古今相禪」，而日本漢字之外有假名，漢字只是「補闕之具」。因此限制字量在日本或可，在中國豈止不可，反而應該反其道而行。由此介紹到《新方言》，「得三百七十事」，均是爲方言尋本字：

> 若綜其實，則今之里語，合於《說文》《三倉》《爾雅》《方言》者正多。雙聲相轉而字異共〔其〕音，鄰部相移而字異其韻，審知條貫，則根柢豁然可求……若徧討九州異語，以稽周秦漢魏間小學家書，其文字往往而在，視今所習用者，或增千許……。

這些一般人眼中的「廢棄語」，存於「今世方言」，在太炎看來，「上

---

54 太炎：〈漢字統一會之荒陋〉，《民報》第17號，1907年10月25日。

55 章太炎：重訂本《訄書・訂文・正名雜義》，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213。

合周漢者眾，其寶貴過於天球九鼎，皇忍撥棄之爲」。[56] 因而，「略紬殊語，徵之古音」，[57] 則可以使得「已陳之語，絕而復蘇，難諭之詞，視而可識」。[58]

「筆箚常文」中的「死文字」，在「今世方言」中是「活語言」。章太炎《新方言》所致力的方向，就是要從方言中復活已廢棄文字，在這樣的「文言一致」基礎上「統一民言」：

> 俗士有恆言，以言文一致爲準，所定文法，率近小說、演義之流。其或純爲白話，而以蘊藉溫厚之詞閒之，所用成語，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無言文歧義之徵，而又深契古義，視唐宋儒言爲典則耶。昔陸法言作《切韻》，蓋集合州郡異音，不悉以隋京爲準。今者音韻雖宜一致，如所謂官音者。然順天音過促急，平入不分，難爲準則。而殊言別語，終合葆存。[59]

當時所謂「言文一致」，主體思路是以文就言。而北方方言地域最廣，使用人口最多，其中北京方言因政治、文化上的原因頗居優勢。至於書寫語言，則發端於唐宋的白話文，與所謂「官話」語法系統一致，即太炎所謂「小說、演義之流」。不過他反對「純爲白話」，就因爲只是源出唐宋，遠不如方言「本無言文歧義之徵，而又深契古義」。「一返方言」，既解決言文一致的現實問題，又與語言文字的歷史建立高度統一性。地域之別、古今之異，在他的方案中遍包眾有，融爲一體，得到徹底的安置，「合天下之異言以成新語」。[60] 不得不說，這確實是完美得讓人暈眩的秩序。

---

56 以上所引，見太炎：〈漢字統一會之荒陋〉，《民報》第17號。

57 章太炎：《新方言・新方言序》，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頁4。

58 黃侃：《新方言・後序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頁135。

59 太炎：〈漢字統一會之荒陋〉，《民報》第17號。

60 章太炎：〈與錢玄同〉（1907年8月18日），收於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01。

不過，所謂「一返方言」，方言本身就意味著差異的存在，共同語可以是統一體，方言總要有所取捨。事實上，早在《訄書》，就有〈方言〉一章討論了這個問題，曰不當取宛平（北京）而當取夏口（漢口）。這在太炎那兒自有充分的語言史根據，「是故言必上楚，反朔方之聲於二南，而隆周召」。[61]

任何方言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而章太炎的性格是必求其極致。陸法言因此成爲榜樣，《切韻》係隋初八人論列天下音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的產物，雖以洛陽音爲主，但實是折衷南北，「皆采合州國殊言，從其至當，不一以隋京爲準，故縣諸日月而不刊」。[62]〈切韻序〉「我輩數人，定則定矣」，這種只問是非並且毅然承擔的風度顯然於太炎很是投緣，他的方略，「循法言《切韻》之例，一字數音，區其正變，則雖謂周漢舊言，猶存今世可也」：

> 今之聲韻，或正或譌，南北皆有偏至。北方分紐，善府於神珙，而韻略有函胡。廣東辨韻，眇合於法言，而紐復多殽混。南北相校，惟江漢處其中流，江陵、武昌，韻紐皆正，然猶須旁采州國，以成夏聲……既以江漢間爲正音，復取四方典則之聲，用相和會，則聲韻其無謬矣……若知斯類，北人不當以南紀之言爲磔格，南人不當以中州之語爲冤句，有能調均殊語，以爲一家，則名言其有則矣。[63]

簡言之，即「不從鄉曲，不從首都」。此在章太炎有他的理由，「蓋漢字以形爲主，於形中著定諧聲之法，雖象形指事會意諸文，亦皆有正音在。非如歐洲文字，以音從語不以語從音，故可強取首都爲定

---

61 章太炎：重訂本《訄書・方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207。

62 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1908年10月10日。

63 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民報》第21號，1908年6月10日。

也」。就他的判斷，「今宛平語，不如江寧審正多矣，而江寧復不逮武昌審正，然武昌亦一二華離。故余謂當旁采州國以補武昌之闕」，非但如此，「名詞雅俗亦當雜采殊方，夫政令不可以王者專制，言語獨可以首都專制耶」。[64] 章太炎《新方言》的工作，其根本的目標，就是「旁采州國」「雜采殊方」，爲中國共同語建設打下基礎，這是一個徑行獨往的方略：

> 文言合一，蓋時彥所譁言也。此事固未可猝行，藉令行之，不得其道，徒令文學日窳。方國殊言，閒存古訓，亦即隨之消亡。以此闇圉烝黎，翩其反矣。余以爲文字訓故，必當普教國人。九服異言，咸宜撢其本始。乃至出辭之法，正名之方，各得準繩，悉能解諭。當爾之時，諸方別語，庶將斠如畫一……。[65]

理想可謂無比高蹈，但這是個只在理論上圓洽的設計。「文字訓故」需要「普教國人」，另外還須「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66] 對於這一計劃的前景，章太炎有他的想像：

> 可知中夏言文，肇端皇古，雖展轉遷變，而語不離其宗。凡南北省界偏黨之見，自此可斷，並音簡字愚誣之說，自此可消。以此讀周秦兩漢之書，向所視爲詰詘者，乃如造膝密談，親相酬對……。[67]

簡而言之，即是以歷史統一當下，以時間統一空間，「簡稽古語，以審今言，如執左券，以合右方之契，雖更千載，而豪忽未嘗相左」。[68]「尋其語根，得其本字」所造成的「言」，與「周秦兩漢之書」的

---

64 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
65 章炳麟：〈正言論〉，《國故論衡》，上卷，頁61。
66 無署名：〈博徵海內方言告白〉，《民報》第17號以後各期。
67 無署名：〈新方言定本〉，《國粹學報》第56期，1909年8月5日。
68 太炎：〈漢字統一會之荒陋〉，《民報》第17號。

「文」，完全融洽，「古今語言，雖遞相嬗代，未有不歸其宗，故今語猶古語也」。[69] 這種共時性與歷時性的渾然一體，一方面可以消除地域的差異，另一方面，追尋「語不離其宗」的「宗」，與「皇古」牢固連結，將人民的口頭用語與歷史典籍融爲一體，此即太炎的「文言合一」。

對章太炎而言，這個獨得的「文言一致」並「統一民言」的方案，於內有「輯和民族，齊一語言，調度風俗，究宣情志」，[70] 建立民族共同體的目的。同時，於外則有使「國性不醨」，文化不被同化的作用。

《新方言》作爲一項學術工作，目標並不在於方言的調查和研究，而是爲中國共同語設計完美的方案。方言眾多，太炎局促海外，不可能遍訪九州，摭拾遺言。依賴周圍朋友提供口語材料，難以避免有所差錯，大概他心裡也清楚。因而一直希望同好參與，後學繼承。1914 年被袁世凱軟禁北京，5 月決意絕食，自分必死，乃馳書其婿龔寶銓，托求墓地，交代後事。斯所慨然，「夫成功者去，事所當然，今亦瞑目，無所吝恨。但以懷抱學術，教思無窮，其志不盡……所欲著之竹帛者，蓋尚有三四種，是不可得，則遺恨於千年矣」。[71] 稍早前，作〈題所撰初印本《新方言》予黃侃〉，自以爲「終已不得反鄉里，上先人冢墓」，遂以「《新方言》三百七十事贈黃季剛」，此可看作太炎的學術遺囑：

> 季剛年方盛壯，學術能爲愚心稠適，又寂泊愿握苦節。此八百事，賴季剛桄大之。余自分問學不逮子雲隃遠，身爲皇漢之逸民，差無符命投閣之恥。念欲自擬幼安嗣宗，又劣弱不勝也。

---

69 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收於章太炎撰，虞雲國校點：《菿漢三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年），附錄，頁 196。

70 章太炎：〈代議然否論〉，《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頁 305。

71 章太炎：〈與龔未生書〉，1914 年 5 月 23 日，收於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頁 702。

保氏舊文，危若引髮。絕續之際，愿季剛亹亹而已。[72]

三

章太炎的語言文字觀，要言之，首先認爲文起於言，文字「權輿於語言」，這自然並無特別。他立論的重點在於二者的「殊流」，即「語言文學〔字〕功用各殊」。[73] 文字有言語不能取代的作用，「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則有獨至」。[74]〈訂文〉中關鍵一個論斷就是：

文因於言，其末則言犖迫而因於文。

在言語力所不能及的邊界，文字開始承擔起作用。文字所表達的較言語更加複雜，「名實惑眩，將爲之別異」，並不是言語的替代或附庸。職是之故，「文之瑣細，所以爲簡也。詞之苛碎，所以爲樸也。」言或同音，不可分辨，字則異形，各司其義。因而文字的「瑣碎」，正意味著意義分辨的細微準確，「言各成義，不相陵越」，所以反而越是「簡樸」。[75]

章太炎的學術工作並非僅僅爲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要處理現實關懷的，「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學之用趣於道古而止，微歟」。[76] 所謂「道古」，遠不能概其志趣。在他看來，語言文字的局面，內則北宋以降，文字大壞，「唇吻所倚，千名而足。檄移所倚，二千名而足。細旃之所承，金匱之所藏，箸於文史者，三千名而足。清廟之所奏，同

---

72 以上所引，見章太炎：〈題所撰初印本《新方言》予黃侃〉，《雅言》第6期，「章太炎文錄（續）」，1914年3月10日。

73 章炳麟：〈文學說例〉，收於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下集，頁403。

74 章炳麟：〈論文學〉，《國學講習會略說》，頁43、46。

75 以上所引，見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44-46。

76 章太炎：《新方言・新方言序》，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頁3。

律之所被，箸於賦頌者，四千名而足」。外則西方文化大舉進入，「今自與異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糵，猶暖暖以二千名與夫六萬言者相角。其寔便既相萬，及緣傳以譯，而其道大窮」。[77]

關於文字，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面臨當下新知識爆炸性的增長，自然需要新造。但這方面章太炎是有節制的，認爲已有的基本夠用，首先要從「廢棄語」中起死復生，不得已者才須新造：

> 古者製字，非有一成之律，如君臣父子夫婦倗友，皆有正字。兄弟獨無，其後特製鬻字，字既從弟，而弟復無正文。是皆待後人之補苴增廣也。然自《說文》以至《集韻》，遞增之字，以足倚用。今之有物無名，有意無詞者，尋檢故籍，儲材不少，舉而用之，亦猶修廢官也。必古無是物，古無是義者，然後創造，則其功亦非難舉矣。[78]

不管是「舉而用之」還是「創造」，都是爲了漢字能夠承擔複雜的社會需要，文字本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斷增加，「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盛，則文以益繁」，此即所謂「孳乳」。[79]

文字需要意義明確，系統嚴密，不可串亂而導致「名實圄殽，易致眩惑」，才能擔負從政教到學術到文辭到日常交流各方面的作用。對此章太炎有著強烈的「潔癖」，比如要求「故有之字，今彊借以名他物者，宜削去更定。如鎕銻，本火齊珠也，今以銻爲金類原質之名。汽，本水涸也，今以汽爲蒸气之名。」其中如「銻」，是近代以來最大一批新造字中的一員，其在於化學元素週期表的輸入，當時的五六十種元素，已有文字中只有金銀銅鐵錫及鉛汞等少量可用，

---

77 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46-47。

78 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正名略例》，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47。

79 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44。

於是以形聲法大量創造，其偏旁如「气」如「金」如「石」。「銻」即其一，造者初未料漢字原有，意義絕異，因而太炎認爲「必當更定」。[80]

相對而言，新造字數量並不多，而已有文字的使用狀況，才是章太炎關注的重點。尤其「六書」中的「假借」一例，〈文學說例〉云：

> 六書初朔，形聲事意，皆以組成本義。而言語筆札之用，則假借爲多。自徐楚金繫《說文》，始有引申一例。然鄦君以「令」「長」爲假借。「令」者發號，「長」者久遠，而以爲司號令，位夐高之稱，是則假借即引申。與夫意義絕異而徒以同聲通用者，其趣殊矣。

〈說文解字敘〉:「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太炎引徐鍇之說，以爲假借就是引申。而「意義絕異而徒以同聲通用者」，[81]即後來章太炎所說的「通借」，[82]在他的系統中是排除在「六書」之外的。不斷道及，很大程度上乃是與劉師培的爭論相關。[83]「假借」本爲「六書」之一，但與「形聲事意」不同，並不「組成本義」。太炎借用姊崎正治的觀點，「言語本不能與外物吻合，則必不得不有所表象」，以爲「假借」即所謂「表象主義之病質」。惟其既不可免，而期其少，且文字的增加本就有此救治的功能：

> 惟夫庶事緐興，文字亦日孳乳，則漸離表象之義，而爲正文。如「能」如「豪」，以猛獸爲表象。如「朋」如「羣」，以禽獸

---

80 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正名略例》，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48。

81 以上所引，見章炳麟：〈文學說例〉，收於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下集，頁403-404。

82 獨角：〈論文字的通借〉，《教育今語雜誌》第4冊，1910年6月6日。

83 參見王風：〈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收於夏曉虹、王風等著：《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頁239-247。

> 爲表象……久之「能」則有「態」,「毫」則有「勞」,「朋」則有「倗」,「羣」則有「窘」,皆特製正文矣。而施於文辭者,猶慣用古文,而怠更新體。由是表象主義,日益浸淫。

章太炎文字古色生香,惟其好用本字古義。但後人對他多所誤會,其所謂「本字古義」,並非一般理解的越古老越好。其所云者「正文」,既包括初文,也包括「孳乳」的後出文字,「本由一語,甲毛而爲數文者」,文字之精密端由於此。因而「新體」既出,就不應再用「古文」代表。如此整個文字系統才能夠各司其職,周密運轉,不斷發展,應付時代的變化,滿足社會的需求。

不過,有關「文字」,此時章太炎並未找到滿意的理論體系。這其中關鍵的問題就是,不可能所有的「庶事繇興」都能「特製正文」,大量的還需「假借」「轉注」。〈文學說例〉借用姊崎正治的理論,談到「假借」:

> 夫號物之數曰萬,動植金石械器之屬,已不能盡爲其名。至於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無體象,則不得不假用他名以表之。若動靜形容之字,在有形者,已不能物爲其號,而多以一言槩括。在無形者,則更不得不假借以爲表象。

而「表象主義」乃是「病質」,太炎語中盡顯無奈,「雖然,人未有生而無病者,而病必期其少」。但「六書」之中,「假借爲多」,[84] 顯然這樣無序的狀態不能讓人滿意,他一時也找不到完滿的解釋。數年後的〈論語言文字之學〉,投入大量篇幅重新闡釋這個問題,文中先是「引申假借」不斷連用,接著討論「轉注」和「假借」:

> 然則轉注之義,許實誤解。實則所謂轉注者,即是引申之義。如發號爲令,引申則爲縣令。久遠爲長,引申則爲長者。許

[84] 以上所引,見章炳麟:〈文學說例〉,收於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下集,頁404-405。

> 氏以此爲假借，不知此乃轉注也……如水流注，輾轉不絕，故得轉注之名。若夫假借之例，則所謂依聲託事是已。然有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亦有本有其字依聲託事者。本無其字者，畧有二種，一與轉注相近，一與轉注相遠……本有其字者，如近世仍用之字，多借同音同部同紐者以代正文……亦有後人爲之則稱別字，古人爲之則稱假借者……此二者皆是本有其字者也……。

早年他引徐鍇的說法，以爲「假借即引申」，此時改稱「所謂轉注者，即是引申之義」，故而「引申」代替「轉注」與「假借」連用。關於「轉注」，在「六書」中最爲難解，因而歷史上爭議也最大，但都爲探究許愼原意。章太炎直謂「許實誤解」，說明其目的完全不同，在於如何爲我所用，解決自己的理論問題。

至於「假借」則解釋得非常複雜，尤其「後人爲之則稱別字，古人爲之則稱假借者」，雖然太炎說「實乃沿襲誤用，但其由來已久，故亦無所訾議」。但就其求完美的風格而言，這樣的認可簡直就是個意外。此於《國故論衡》可以見之，〈論文學〉即《國粹學報》上的〈文學論略〉，刪削後以〈文學總略〉爲名整體收入。而〈論語言文字之學〉則腰斬之，此段所在前半部分廢棄，說明他並不滿意。而後半部分以〈語言緣起說〉爲名改寫後編錄，其中從另一個角度又談及「轉注」和「假借」。〈論語言文字之學〉較〈語言緣起說〉所改寫者，所述更爲詳細易解：

> 其釋轉注，亦未嘗不可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而義則與許君有異。許所謂「首」，以形爲之首也；吾所謂「首」，以聲爲之首也。許所謂「同意相受」，兩字之意不異毫釐，得相爲互訓也；吾所謂「同意相受」，數字之義成於遞演，無礙於歸根也。雖然，此轉注也，而亦未嘗不爲假借。就最初言，祇造聲首之字，而一切遞演之字，皆未造成，則聲首之字，兼該

> 遞演之義，是所謂轉注也。就今日言，已有遞演之字，還觀古人之專用聲首，以兼該諸義者，則謂之「本無其字，依聲托事」。是即所謂假借之近於轉注者也。[85]

如此，在文字歷史的維度上，「轉注」和「假借」獲得新的視角。太炎之所以如此極力推究，所關心者其實正在「遞演」二字。《國故論衡》中，〈語言緣起說〉之後緊接〈轉注假借說〉，則橫掃一切，別立機杼：

> 余以轉注、假借，悉爲造字之則。汎稱同訓者，後人亦得名轉注，非六書之轉注也。同聲通用者，後人雖通號假借，非六書之假借也。蓋字者，孳乳而寖多。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雙聲相轉，疊韻相迆，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孳乳日繁，即又爲之節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則不爲更制一字，此所謂假借也。[86]

以「轉注」「假借」爲「造字之則」，可謂一反成說。這既包括前人，也包括他自己。分「六書」爲「造字」「用字」兩類，是清儒如戴、段等的說法，戴震所謂「四體二用」，[87] 又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蓋有指事、象形，而後有會意、形聲，有是四者爲體，而後有轉注、假借二者爲用。」[88] 早前章太炎〈正名略例〉言：「其在六書，本有叚借一例，然爲用字法，非爲造字法。」[89] 在〈論語言文字之學〉

---

[85] 以上所引，見章炳麟：〈論語言文字之學〉，《國學講習會略說》，頁13-16、25。

[86] 章炳麟：〈轉注假借說〉，《國故論衡》，上卷，頁47。

[87] 戴震著，湯志鈞校點：《戴震集・答江愼修先生論小學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文集三，頁75。

[88] 段玉裁：〈說文解字敘注〉，《說文解字注》（〔清〕嘉慶二十年（1815）經韻樓刻本），卷十五上，頁7。

[89] 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正名略例》，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48。

中，也是以「轉注」「假借」爲「用字之法」。並稱「轉注、假借二者，實軼出形體之外，因循舊論，始以形體概之。此後專明引申、假借之事則屬訓詁者。」[90] 而到《國故論衡》，他卻以爲「二君立例過嫌，於造字之則既無與」。「轉注」並非戴段所謂「同訓」，而是因爲「方語」的不同「爲更制一字」。「假借」也並非阮劉認爲的「同聲通用」，而是由於「引申」乃「不爲更制一字」，此爲不造之造。

太炎最早以「引申」解釋「假借」，後來改爲解釋「轉注」，此時又回過頭來，「引申之義，正許君所謂假借」。如此反復，其實都爲了尋找完美的理論闡述。現實中文字的濫用和敗壞在他那兒是錐心之痛，「表象主義」原也是他無可奈何不得不和解的理論敵人。此時也許終於可以找到最終的理論解脫了：

> 轉注者，繁而不殺，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節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爲繁省大例。[91]

如此具有對稱美的表述，確有渙然冰釋之感。在章太炎那兒，十年的努力之後，也許是如釋重負。文字如何「孳乳」是他要解決的問題，如今終於有了井然的秩序。當然，這是否就是許愼所謂「轉注」、「假借」，早已不是他關心的問題。因爲，即使「六書」最初出處的《周禮・地官》，他也以爲「或言六書始於〈保氏〉，殊無徵驗」。他所要溯源的是「倉頡」的本心，「倉頡初載，規摹宏遠，轉注假借具於泰初」。[92] 因而黃侃讚美道：「其〈轉注假借說〉一篇，訂正群言，奭然而解，不僅爲叔重之功臣，蓋上與倉聖合符，下與虎門諸儒接席矣。」[93]

---

[90] 章炳麟：〈論語言文字之學〉，《國學講習會略說》，頁16。

[91] 以上所引，見章炳麟：〈轉注假借說〉，《國故論衡》，上卷，頁52。

[92] 章太炎：〈文始敘例〉，《文始》，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61。

[93] 黃侃：〈聲韻通例・附：與人論治小學書〉，《黃侃論學雜著》，頁

「轉注」、「假借」之所以讓章太炎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在於他想爲龐大的漢字系統尋找一個完善的理論。「古字至少，而後代孳乳爲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矣，自非域外之語，字雖轉緐，其語必有所根本，蓋義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聲，轉成一語，轉造一字，此語言文字自然之則也。」因而作《文始》，指向文字之源，梳理「孳乳浸多之理」，[94] 希圖爲所有漢字建立聯繫：

> ……獨欲浚抒流別，相其陰陽。於是刺取《說文》獨體，命以初文。其諸省變，及合體象形、指事，與聲具而形殘，若同體複重者，謂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爲四百五十七條。討其類物，比其聲均。音義相雝，謂之變易。義自音衍，謂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95]

〈說文解字敘〉言：「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轉注」、「假借」是所謂「字」的問題，而《文始》則直指「文」，再言其「變易」和「孳乳」。其最終目標，依黃侃的說法，「令諸夏之文，少則九千，多或數萬，皆可繩穿條貫，得其統紀」。[96]

「少則九千，多或數萬」，就來自於章太炎，《訄書・訂文》：

> 章炳麟曰：烏乎，此夫中國之所以日削也。自史籀之作書，凡九千名，非苟爲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諺言。秦篆殺之，《凡將》諸篇繼作，及鄦氏時，亦九千名。衍乎鄦氏者，自《玉篇》以逮《集韻》，不損三萬字，非苟爲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諺言。

147-148。

94 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菿漢三言》附錄，頁196。

95 章太炎：〈文始敘例〉，《文始》，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頁160。

96 黃侃：〈聲韻略說・論斯學大略〉，《黃侃論學雜著》（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4年），頁94。

其時章太炎憂心如焚於中國之「日削」，在於「英語最數，無慮六萬言」，而中國「其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則蔇乎檄移之二千而止」。[97] 民國後《訄書》增刪並更名爲《檢論》，〈訂文〉一篇也經改寫，相關文字則易爲：

> 章炳麟曰：中國之字，非少也。今小篆九千文，以爲語柢，其數過於歐洲。絫而成名，則百萬以往。[98]

從「日削也」到「非少也」，從「二千名」與「六万言」的不能「相角」，到「其數過於歐洲」，可見原先的焦慮已轉爲現下的信心。心情之所以有此轉換，在於手邊的《文始》已經寫定，可以流布。

就章太炎自己的評價，這是他終極性的學術工作之一，實係發千古之覆，「斯蓋先哲之所未諭，守文者之所痀勞」。[99]《新方言》「文理密察，知言之選，自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矣」。[100] 而《文始》則更與《齊物論釋》同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與儒先立異，亦不欲爲苛同……可謂一字千金矣」，[101] 斯「總集字學、音學之大成，譬之梵教，所謂最後了義」。[102] 民初被袁世凱拘禁，弟子錢玄同爲鈔《文始》副本未竟，移書催促，自謂「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矣。原書返我，或可望〈堯典〉同棺耳」。[103]

不過後之論者可未必以爲然，最嚴厲也最有名的評價來自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曰：

---

[97] 以上所引，見章太炎：重訂本《訄書・訂文》，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208。

[98] 章太炎：《檢論・訂文》，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頁489。

[99] 章太炎：〈文始敘例〉，《文始》，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頁160-161。

[100] 太炎：〈漢字統一會之荒陋〉，《民報》第17期。

[101] 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菿漢三言》附錄，頁191。

[102] 黃侃：〈聲韻通例・附：與人論治小學書〉，《黃侃論學雜著》，頁164。

[103] 章太炎：〈與錢玄同〉（1913年2月5日），收於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頁148。

> ……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學問上的大權威。章氏在文字學以外是個文人，在文字學以內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過孫詒讓，再步倒退過吳大澂，三步倒退過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別人已經開頭用了的新材料，他還抹殺著。至於那部《新方言》，東西南北的猜去，何嘗尋揚雄就一字因地變異作觀察？這麼竟倒退過二千多年了。[104]

此「二千多年」正與太炎之「千六百年」相映成趣。史語所可謂傅斯年一手而立，領導二十多年。此公有能力，也有毅力，有定見，也有成見。本來，史語所作爲中央研究院的一個機構，海納百川，不應有特定立場，傅則建設得像個學派。即便章氏一路此時並不在他眼中，但也不適合在綱領性文件中表達立場。固然其批判並非毫無道理，後來的語言學家雖肯定太炎貢獻，也多指出《新方言》《文始》說錯的，並不是一個小比例。這有學術方面的原因，比如章立「成均圖」，對轉、旁轉，乃至交紐轉、隔越轉，結果幾乎無所不轉。[105] 但造成這樣的問題，恰恰是由於章太炎並不像傅斯年或絕大部分現代學者所認爲的，歷史學、語言學等等僅僅是一門科學。所謂「學術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106] 他發動「學術」所要「救」的，是如此廣大的「偏」，誠如木山英雄所言，「當傳統已經不能成爲自明的前提時，便出現了根本性的危機，這種對於危機的自覺決定了章炳麟國學追本溯源的性格」。[107] 探討語言文字，實關係著民族有以立所以存的根基。懸此爲的，自然一往而深，不能自已。

因而，《新方言》固然「猶未周備」，[108]《文始》固然「未達神

---

[104] 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號（1928 年 10 月），頁 4。
[105] 章炳麟：〈成均圖〉，《國故論衡》，上卷，頁 7-8。
[106] 絳：〈通訊〉，《國粹學報》第 59 期，1909 年 11 月 2 日。
[107] 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16。
[108] 太炎：〈漢字統一會之荒陋〉，《民報》第 17 號。

恉，多所缺遺」，[109] 仍無廢於「縣諸日月」「一字千金」。因爲他覺得自己的理論已經給出這樣的判斷：「今語雖多異古，求之爾雅方言說文，必有其字，故漢語最純潔不雜。其有雜者……待正則之語言統一，則鄙言自廢矣。」[110] 得出「漢語最純潔不雜」的結論，這在太炎自是心願完足，因爲大局已定，拾遺補缺，待之來者可也。

四

章太炎所謂「文學」，也須在他的「語言文字之學」的基礎上才能理解，所謂「文辭之本，在乎文字」。[111]〈文學說例〉定義「文學」：「爾雅以觀於古，無取小辯，謂之文學。」其所云者，在如何運字成文，姑可稱爲「書契之學」，與現如今所謂「文學」風馬牛不相及。在他「正文」的觀念下，其於「質言」「文言」之間的價值取向就不難理解了，所謂「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因而「斲雕爲樸，亦尚故訓求是之文而已」，至以注疏一體爲「文辭之極致也」。

按章太炎的看法，「文學陵遲」起於「衰宋」，在於「蒼雅之學」的沒落，「訐誕自壯者，反以破碎譏往儒，六百年中，人盡盲瞽」。至「戴先生」與「王段二師」，「綜會雅言，皆眾理解」，可謂撥亂反正。不過「不及百年，策士群起，以衰宋論鋒爲師法，而諸師復受破碎之誚」，這也就是太炎所要對抗的當下文化之「病」。譏誚「破碎」，炫耀辭彩，正無異於「中夏言詞」的墮落，[112] 更嚴重的是，其所帶來的是整個社會的退化。

數年後，收入《國學講習會略說》中的〈論文學〉，議論方向已

---

[109] 章太炎：〈文始敘例〉，《文始》，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頁160。
[110] 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
[111] 章炳麟：〈論語言文字之學〉，《國學講習會略說》，頁3。
[112] 以上所引，見章炳麟：〈文學說例〉，收於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下集，頁404-406。

不相同，其定義曰：「何以謂之文學，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113] 此所謂「文學」，則是「文體之學」，舉凡一切入於「竹帛」者，魯迅所謂「自文字至文章」，[114] 皆在論列範疇，亦遠非今之「文學」所可牢籠。不過論說的出發點，仍在「爾雅以觀於古」：

> 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謂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煥發則謂之彣。《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彣䜌也，䜌有彣彰也。或謂文章當作彣彰，此說未是。要之，命其形質則謂之文，狀其華美則謂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是故研論文學，當以文字爲主，不當以彣彰爲主。[115]

論述重點的轉移是爲了回應當時各式各樣的「文學」觀，既有西方過來的 “literature”，也有來自阮元而爲劉師培繼承的「文言」說。章太炎將「文學」坐實在「文」亦即文字上，認爲「文辭」之中，「以典章爲最善，而學說科之疏證類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質實而遠浮華，辭尚直截而無蘊籍」。也就是說，其最遠離於「彣彰」，也就最顯露文字的「形質」，因而「最善」。[116]

當然，〈論文學〉立論的重點還在文體，章太炎舉用「雅俗」、「工拙」兩組概念進行安排。簡言之，「文章」是「雅俗」的問題，「彣彰」是「工拙」的問題，而「工拙者繫乎才調，雅俗者存乎軌則」。一方面，「一切文辭，體裁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比

---

[113] 章炳麟：〈論文學〉，《國學講習會略說》，頁33。

[114] 此係借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一篇」篇題爲說，參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9，頁343。又，黃錦樹云：「一如他把『語言文字之學』理解爲『一切學術之單位之學』，他也把『文學』理解爲一切文字表達的單位表達〔之學〕」，此說甚佳，參見氏著：《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系譜》，頁159。

[115] 章炳麟：〈論文學〉，《國學講習會略說》，頁33。

[116] 參見王風：〈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收於夏曉虹、王風等：《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頁247-259。

如「除小說外，凡敘事者，尚其直敘不尚其比況」。而「韻文以聲調節奏爲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另一方面，「所謂雅者，謂其文能合格」，因而「韻文貴在形容」即是「雅」。太炎另舉例云：「公牘既以便俗，則上準格令，下適時語，無屈奇之稱號，無表象之言詞，斯爲雅矣……古之公牘以用古語爲雅，今之公牘以用今語爲雅。」甚至「近世小說，其爲街談巷語，若《水滸傳》、《儒林外史》。其爲神怪幽秘，若閱微草堂五種，此皆無害爲雅者」。[117]

如此回頭看〈革命軍序〉，章太炎提及鄒容擔心他「惡其不文」，而太炎則認爲「藉非不文，何以致是」。此類文字正不能「務爲蘊藉」，應「以跳踉搏躍言之」。在他眼裡，《革命軍》的「叫咷恣言」，[118] 恰恰無廢其「雅」，而並非僅僅是他權宜的認可。

至少從理論上說，章太炎這套「文學」論述圓滿自洽，美輪美奐。觀其層次，則在文質、雅俗、文野。文質是語體層面上的，質言爲上，計其工拙的文言爲下。雅俗則是文體層面上的，文體各有「法式」，工拙也各有要求，合其「法式」爲雅，反之則俗。和合二者，則所謂「先求訓詁，句分字析，而後敢造詞也。先辨體裁，引繩切墨，而後敢放言也」。只要能「合格」，[119] 則一切文體，藉令如《革命軍》，不分文野，一切平等，也就是其「不齊而齊」的文化理想和審美趨向了。總此一切，章太炎之「文學」，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使用文字之學。

所謂「不齊而齊」，是章太炎一直以來的文化主張，而專門闡發，則集中於《齊物論釋》。其與《文始》等匹，在太炎心目中是首重之作。宣統元年講學東京，〈致國粹學報社書〉云：「弟近所與學子討論者，以音韻訓詁爲基，以周秦諸子爲極，外亦兼講釋典。蓋學

---

[117] 章炳麟：〈論文學〉，《國學講習會略說》，頁53、57-59。
[118] 章炳麟：〈革命軍序〉，收於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下集，頁401-402。
[119] 章炳麟：〈論文學〉，《國學講習會略說》，頁58。

問以語言爲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龠也，以眞理爲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120] 可見其學術多門，核心還在小學和諸子學。民國2年被袁世凱幽禁北京，對內交待家人，「所著數種，獨《齊物論釋》、《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國故論衡》《新方言》《小學答問》三種，先正復生，非不能爲也」。[121] 對外布告世間，「自知命不長久，深思所窺，大畜猶眾。既以中身而隕，不獲於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故略述學術次第，以告學者」，這份〈自述學術次第〉，涉及十個方面，而首先談到的，就是《齊物論釋》：

> ……余既解《齊物》，於老氏亦能推明。佛法雖高，不應用於政治社會，此則惟待老莊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許宋儒……。[122]

章太炎因蘇報案「囚繫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自以爲是其學術最重要收獲。與佛法深有會通，衷心服膺，「私謂釋迦玄言，出過晚周諸子不可計數」。東渡後「端居深觀，而釋齊物，乃與《瑜伽》《華嚴》相會……千載之秘，睹於一曙」。[123] 之所以要「釋齊物」，乃在於「佛法雖高，不應用於政治社會，此則惟待老莊也」，或用他的白話文，「論到哲理，自然高出老莊。卻是治世的方法，倒要老莊補他的空兒」。[124] 以佛解莊，一旦豁然開朗，太炎頗得庖丁解牛之趣：

> 頃來重繹莊書，眇覽《齊物》，芒刃不頓，而節族有間。凡古近正俗之消息，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拘者執箸而鮮通，短者執中而居間，卒之魯莽滅裂，

[120] 絳：〈通訊〉，《國粹學報》第59期。
[121] 章太炎：〈與龔未生書〉，收於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頁702。
[122] 以上所引，見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菿漢三言》附錄，頁192。
[123] 章太炎：〈菿漢微言〉末節，《菿漢三言》，頁71。
[124] 獨角：〈社說〉，《教育今語雜誌》第1冊，1910年3月10日。

> 而調和之效，終未可睹……余則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爲量，割制大理，莫不孫順。

雖然佛法高於老莊，但那是出世間的，因而世事還需「操齊物以解紛」，這也可說是太炎行的「世間法」。所謂「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眞，終乃回眞向俗」，[125] 後人聚訟紛紜，無乃以此求消息焉。

《齊物論釋》按《國故論衡》「小學」、「文學」、「諸子學」的分類體制，分科在諸子之學。《國故論衡・原學》一首，論及諸子學，曰：

> 諸子之書，不陳器數，非校官之業有司之守，不可按條牒而知，徒思猶無補益。要以身所涉歷中失利害之端，回顧則是矣……夫言兵莫如《孫子》，經國莫如《齊物論》，皆五六千言耳。事未至，固無以爲候。雖至，非素練其情，涉歷要害者，其效猶未易知也。

所謂「身所涉歷中失利害之端」、「涉歷要害」，在太炎看來是諸子之學的關鍵。此段其下有雙行夾註：「《莊子・齊物論》，則未有知爲人事之樞者……余向者誦其文辭，理其訓詁，求其義旨，亦且二十餘歲矣。卒如浮海不得祈嚮，涉歷世變，乃始諜然理解，知其剴切物情……。」[126] 也是「浮海」之後，「涉歷世變」，乃「知爲人事之樞者」。《齊物論釋》開首云：

> 齊物者，一往平等之談……齊其不齊，下士之鄙執，不齊而齊，上哲之玄談。[127]

用烏目山僧〈後序〉的說法，即「名相雙遣，則分別自除，淨染都

---

[125] 以上所引，見章太炎：〈菿漢微言〉末節，《菿漢三言》，頁72。
[126] 以上所引，見章炳麟：〈原學〉，《國故論衡》，下卷，頁149。
[127] 章太炎：《齊物論釋・釋篇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4。

忘，故一眞不立。任其不齊，齊之至也。」[128] 章太炎所謂「齊物」之「齊」，是在於承認並尊重「物」之「不齊」，這才是眞正的「齊」，「不齊而齊」說白了就是差異的平等。在他那兒，「平等」不只是現代觀念中的人人平等，也包括佛家所謂眾生平等，莊子的物我平等。更重要的是泯絕是非，去除「是非之心」，也就是他自言「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的「排遣名相」，[129] 黃宗仰所云「名相雙遣，則分別自除」，除「分別」才能有眞正的「平等」。

《齊物論釋・釋篇題》中有下面一段話：

> ……世法差違，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於嫺，兩不相傷，乃爲平等。小智自私橫欲，以己之嫺，奪人之陋，殺人劫賄，行若封豨，而反崇飾徽音，辭有枝葉。斯所以設堯伐三子之問。下觀晚世，如應斯言，使夫饕餮得以逞志者，非聖智尚文之辯，孰爲之哉。[130]

所謂「野者」、「都者」，應該「兩不相傷」。現實的情況當然完全相反，「殺人劫賄」、「而反崇飾徽音」。「聖智尚文之辯」，恰恰是那些「饕餮得以逞志者」的口實。這裡提到的「堯伐三子之問」，本文云：「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對此章太炎「釋」曰：

> 原夫《齊物》之用，將以內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齊，文野異尚，亦各安其貫利，無所慕往。饗海鳥以大牢，樂斥鷃以

[128] 宗仰：《齊物論釋・後序》，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六），頁58。
[129] 章太炎：〈菿漢微言〉末節，《菿漢三言》，頁71。
[130] 章太炎：《齊物論釋・釋篇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六），頁6-7。

> 鐘鼓，適令顛連取斃，斯亦眾情之所恒知。然志存兼并者，外辭蠶食之名，而方寄言高義，若云使彼野人，獲與文化，斯則文野不齊之見，爲桀跖之嚆矢明矣。

「志存兼并者」總是「寄言高義」，早在〈四惑論〉中斥「公理」等，可爲此論先聲。因爲那都是懸設恒定的標準，而不管差異如何，「文野不齊」，一律作爲統一的目標，讓他者去「進化」。更甚者，可以以此爲名義，強加於弱者，包裝其兼并蠶食之實。對於提供其合法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包括斯賓塞的信仰者嚴復，章太炎可謂痛心疾首，恨不能起秦始皇於當世：「若斯論箸之材，投畀有北，固將弗受，世無秦政，不能燔滅其書，斯仁者所以潸然流涕也。」

從學理上說，《齊物論釋》表達的理論思維非常徹底。所謂「一切平等」，涉及從至巨到至微的一切關係，誠太炎自詡之「一字千金」。不過，「諸子之學」在他那兒，以爲均從「涉歷」中來，而他親身經歷的「世變」，亦即華夏「歷史民族」的危機，才是這一學術工作的根本出發點：

> 或言《齊物》之用，廓然多塗，今獨以蓬艾爲言，何邪？答曰：文野之見，尤不易除。夫滅國者，假是爲名，此是檮杌、窮奇之志爾。

所謂「滅國者，假是爲名」，是章太炎力破「文野之見」的動力。隨後則涉及他的另一個批判對象，亦即以《新世紀》聚集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至平等」，在太炎看來，這些中國人也是要「齊其不齊」，而無異於文化自殺：

> 如觀近世有言無政府者，自謂至平等也。國邑州閭，泯然無閒，貞廉詐佞，一切都捐，而猶橫箸文野之見。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勞形苦身，以就是業，而謂民職宜然，何其妄

> 歟。故應務之論，以齊文野爲究極。[131]

巴黎世界社成立於1907年，主要成員有張靜江、李石曾等，但主《新世紀》筆政的是吳稚暉。章太炎一生論敵眾多，他放筆痛詆，每每由文及人，不避意氣用事之態。但大體還視對方爲對手，惟於吳稚暉，自1903年在愛國學社同事，即互爲寇讎，至於文筆纏訟終身。吳於《新世紀》時受克魯泡特金互助論影響，大肆宣揚「大同世界」，其與康有爲《大同書》一樣，都有儒家大同思想的痕跡。同樣與康有爲一樣，都以爲世界語言終將大同。[132]

章太炎在〈自述學術次第〉裡，就學術不同範疇的不同性質，闡明他的一個看法：

> 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於言文歷史，其體則方，自以己國爲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猶多惑亂，斯可怪矣。[133]

「在物」之學，所指當如械器動植。「在心」之學，他所服膺的「唯識」，包括他自己的《齊物論釋》，應皆在其列。是所謂「無間方國」，天地間皆通用者。而「言文歷史」則異於是，「以己國爲典型」，乃係「國」之所係屬。或者借用太炎自己的說法，應該「不齊而齊」。吳稚暉的「大同」，卻正是「齊其不齊」，而且延伸至語言文字領域，這無疑挑動了章太炎最敏感的一根神經：

> 夫科學固不能齊萬有而創造，文字復與科學異撰。萬物之受人宰制者，縱爲科學所能齊。至於文字者，語言之符。語言者，心思之幟。雖天然語言，亦非宇宙閒素有此物，其發端尚在

[131] 以上所引，見章太炎：《齊物論釋・釋第三章》，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六），頁39-40。

[132] 參見曹世鉉：《清末民初無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120-171。

[133] 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菿漢三言》附錄，頁196。

> 人爲，故大體以人事爲准。人事有不齊，故言語文字亦不可齊。[134]

吳稚暉等人在《新世紀》上的主張，正是以「齊」、「言語文字」爲旗幟，希望用「萬國新語」取代漢語言文字。所謂「萬國新語」，亦即當時出現不久的「世界語」。他們基本的邏輯，認爲象形文字是原始野蠻的，字母文字是進化文明的，而歐洲諸種語言還各有問題，「萬國新語」消滅了這些缺點，因而最爲完美，是語言進化到「大同」的終極，也是漢語言文字改革的最終目標。開始時，他們還設計逐步向目標前進的步驟，後來乾脆認爲，直接取用「萬國新語」，消滅漢語言文字，則最爲斬截，甚至可以較東西洋諸國更快地一步邁進大同世界。[135]

「萬國新語」是晚清拼音化運動中特殊的一支，拼音化運動方案眾多，不過歸根結底邏輯都是一致的，即文字的進化規律是從象形到字母，漢字是象形，需要演化到字母。而中國教育不能普及，以及種種落後，漢字的象形是其禍根。《新世紀》所言也不過如此，「其所執守，以象形字爲未開化人所用，合音字爲既開化人所用。且謂漢文紛雜，非有準則，不能視形而知其字，故當以萬國新語代之」。[136] 所不同者，也只是其主張相較而言最爲激進而已。

此前一年的1907年，章太炎爲文批判「漢字統一會」，言下尚有恕詞，尤其對於張之洞，這與其早年曾爲張之幕賓有關。但更因此會目標在於「反對羅甸字母……遵循舊文，勿令墜地」，而「微顯闡幽之義」。[137] 至於「萬國新語」，卻是以「羅甸字母」來消滅漢字，對此動搖文化根本的主張，太炎自然不可能假以辭色：

---

[134] 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
[135] 參見羅志田：〈清季圍繞萬國新語的思想論爭〉，《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頁86-144。
[136] 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民報》第21號。
[137] 太炎：〈漢字統一會之荒陋〉，《民報》第17號。

> 巴黎留學生相集作《新世紀》，謂中國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蓋季世學者，好尚奇觚，震懾於白人侈大之言，外務名譽，不暇問其中失所在，非獨萬國新語一端而已。

直斥之曰「季世學者」，《中庸》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大約可作太炎此時心情寫照，「彼欲以萬國新語剿絕國文者猶是」。[138]《新世紀》的目標是準備讓中國融入大同的美好未來，正是要「齊其不齊」的。而章太炎所關於心者，「夫國無論文野，要能守其國性，則可以不殆」，[139]其全部心血投在語言文字，正是因爲「若夫民族區分，捨語言則無以自見，一昔棄捐其固有，而執鸜鵒狌狌之業，無往而可」。執此而觀，吳稚暉等所主張，簡直喪心病狂，斯「則欲絕其文字，杜其語言，令歷史不燔燒而自斷滅，斯民無感懷邦族之心」。如是則「國性」盡失，「光復」云云也就永不可期了：

> 且品物者天下所公，社會者自人而作，以自人而作，故其語言各含國性以成名，故約定俗成則不易……語言文字亡，而性情節族滅，九服崩離，長爲臧獲，何遠之有。吾且謂自改舊文者，其禍猶厲於強迫，強迫者有面從而無誠服，家人父子莫夜造膝之間，猶私習故言，以抒憤懣。故露人偵伺雖嚴，而波蘭語猶至今在，其民亦忼慨有獨立心，後之光復，尚可□也。至於自改舊文者，不終於塗炭不止。[140]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規新世紀〉引錄《新世紀》觀點，逐條批駁，不厭其細，以求從學理上全面推倒。對於漢字有礙教育的觀點，他認爲「國人能徧知文字以否，在強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時至今日，事實證明這個看法是正確的。而漢字之不能拼音

---

138 以上所引，見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

139 章太炎：〈救學弊論〉，《太炎文錄續編・卷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01。

140 以上所引，見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

化，在他自然更是論述的重中之重，所謂「象形」問題：

> 且漢字所以獨用象形，不用合音者，慮亦有故。原其名言符號，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意殊者眾，若用合音之字，將茫昧不足以爲別。況以地域廣袤，而令方土異音，合音爲文，逾千里則弗能相喻，故非獨佗方字母不可用於域中，雖自取其紐韻之文，省減點畫，以相絣切，其道猶困而難施。自頡籀斯邈以來，文字皆獨標部首，據形系聯者，其勢固不得已也。[141]

漢文中有不可計數的同音異義詞，是靠字形分別的，改用拼音，將混淆無以辨別。這是技術上的不能成立。中國土地廣闊，語音不同，如果改行拼音，則互相間不能交流。這是現實上的不可行。章太炎沒有進一步推論的是，設若如此，則不知將有多少種語言存在，而不是只有一種「漢語」了。不久後，在《國故論衡・小學略說》中，他揭櫫了中國之爲中國正植根於漢字：

> 若其常行之字，中土不可一用并音，亦誠有以。蓋自軒轅以來，經略萬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并音之用，祇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讀雖明，語則難曉。今以六書爲貫，字各歸部，雖北極漁陽，南暨儋耳，吐言難諭，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海西諸國，土本陿小，尋響相投，媮用并音，宜無疑礙。至於印度，地大物博，略與諸夏等夷，言語分爲七十餘種，而文字猶守并音之律，出疆數武，則筆札不通。梵文廢閣，未踰千祀，隨俗學人，多莫能曉，所以古史荒昧，都邑殊風。此則并音宜於小國，非大邦便俗之器明矣。[142]

所比較者「中土」「海西」「印度」。章太炎曾在〈原學〉中有這樣的判斷：「世之言學，有儀刑他國者，有因仍舊貫得之者……通達之

[141] 以上所引，見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民報》第21號。
[142] 章炳麟：〈小學略說〉，《國故論衡》，上卷，頁2-3。

國，中國、印度、希臘，皆能自恢彊者。其餘因舊（貫）而益短拙，故走他國以求儀刑。」「海西諸國」源於希臘，固不待言。至於印度，佛法之所由出，太炎致以文化上的高度尊敬。對其現實處境，他則深感同情，《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二」有多篇文章涉及。在他眼裡，「西洋」與「西土」，所謂「二西」，那才有資格與華夏並峙，「能自恢彊者」，遠非日本之「轉販」可比。[143]

就這「中土」「海西」「印度」三者，具體到語言文字，又有不同，歐洲和印度的多數語言，同屬「印歐語系」，亦即所謂「并音」。按太炎的說法，「海西諸國」因爲國土較小，用「并音」並無問題。而印度地域遼闊，也用「并音」，結果書寫分裂，「出疆數武，則筆札不通」。獨有中國所用「象形」，秦漢以來，幾千年高度穩定，歷史上無論如何分合，言語如何變化，但書寫高度統一。就各地語音差異，中國並不比歐洲、印度小，但「吐言難諭，而按字可知」，文字不隨語音變化而變化，如此在廣闊地域構築出與久遠歷史相聯結的共同體。設若沒有這樣穩定的文字橋樑，則「言語道窒」，因而「并音宜於小國，非大邦便俗之器」。

章太炎所論，實涉及到語言文字的性質與民族自我認同的關係問題。所謂「漢族」，嚴格地說是建立在「漢字」的認同，而不是「漢語」的認同上。如果僅僅只從語音著眼，漢語內部差異之大，即使不能說是一個語系，至少也是一個語族，何嘗是一種語言。中國地域約略等於歐洲，漢族聚居之地也與印度等大，但人民之間並不互視爲異族，各地語言從古至今均自認爲是方言。其根本原因在於有漢字的控制，無論語音如何變化，文字並不跟著變化。一個漢字，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發生在它上面的讀音可能以千百計，但無論是何讀音，都是這個字形。如果是字母文字，其拼寫恐早也已化身千百。而所謂「華夏」，設若如此，以章太炎所論列，或如歐洲，或如印

[143] 章炳麟：〈原學〉，《國故論衡》，下卷，頁 147-148。

度，即便歷史上存在如拉丁文和梵文這樣的統一書寫，一旦崩潰，則「越鄉如異國矣」。[144] 這層意思，太炎後來用白話說得更加清晰。此即1910年他主編《教育今語雜誌》，創刊號上開篇的〈社說〉，收入《章太炎的白話文》時，改題〈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術的發達〉：

> 中國不用拼音字，所以北到遼東，南到廣東，聲氣雖然各樣，寫一張字，就彼此都懂得。若換了拼音字，莫說遼東人不懂廣東字，廣東人不懂遼東字，出了一省，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豈不是令中國分爲幾十國麼。

由漢字這一體系所形成的書寫文本，自然不像字母文字的文本一樣，需要歷代的翻譯。因而中國的典籍，也就如漢字一般的穩定，由此提供了文本閱讀古今一致的經驗：

> 且看英國人讀他本國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說是古文，難得瞭解。中國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歐陽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現在一樣。懂得現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若看白話，四百年前明朝人做的《水滸傳》，現在也都懂得。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的語錄，也沒有什麼難解。若用了拼音字，連《水滸傳》也看不成，何況別的文章。所以爲久遠計，拼音字也是不可用的。[145]

正是漢字獨有的特點，才能在廣袤的土地上，用共同的閱讀，將人民如此牢固的連結爲一體。在他的觀念中，由此結晶的中土文明，或者可以說是以文字構築的歷史共同體，此即章太炎所謂的「歷史民族」：

> 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訖今茲，四夷交侵，王

[144] 章炳麟：〈小學略說〉，《國故論衡》，上卷，頁5。
[145] 以上所引，見獨角：〈社說〉，《教育今語雜誌》第1冊。

> 道中絕者數矣。然搰者不敢毀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令國性不墮……。[146]

所謂「國性」，正植基於文字書寫的歷史，以此給予人民以記憶。即便作爲國家的實體滅亡，語言文字和歷史記載仍然維繫著民族的文化存在，總有恢復的一天。「故僕以爲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147]「史籍所載」，端賴文字的歷史統一，對此太炎每每情不能自已，〈規新世紀〉厲聲痛駁之間，突然兀自唱嘆起來：

> 章炳麟曰，洋洋美德乎，頡籀斯邈之文，踦形孑義，秒忽判殊，屬辭比類，子母鉤帶，散而爲塵不患多，集而成器不患乏，錯綜九千字，至於百十萬名，魏然弗可尚已。[148]

在〈原學〉中，章太炎闡明了自己的文化立場：「今中國之不可委心遠西，猶遠西之不可委心中國也……夫贍於己者，無輕效人。若有文木，不以青赤雕鏤，惟散木爲施鏤。以是知儀刑者散，因任者文也。然世人大共僄棄，以不類遠西爲恥。余以不類方更爲榮，非恥之分也。」[149] 此所謂「依自不依他」，正如〈答鐵錚〉所云：「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芒鞵，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憚夫奮矜之氣。以此揭櫫，庶於中國前途有益。」[150] 其艱苦卓絕者，是他個人的自我寫照，或也可看作對於中國的期待。而將生命與學術如此動人地聯結在一起，更是可風的永在。所謂「細徵乎一人，其鉅徵乎邦

---

146 章炳麟：〈原經〉，《國故論衡》，中卷，頁88-89。

147 章太炎：〈答鐵錚〉（1906年11月15日），《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頁371。

148 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

149 章炳麟：〈原學〉，《國故論衡》，下卷，頁149-150。

150 章太炎：〈答鐵錚〉，《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頁375。

域」，[151] 於己是爲，於國猶然。

不過總體而言，歷史的選擇與章太炎所希望的正相反，他那高遠幽眇的理想，當然毫無窒礙不通之處，不過確確實實是窒礙難行。儘管有各種各樣的立場和聲音，中國還是得「委心遠西」，此不得不然之局。他所關心的，言文一致問題，選擇了白話文。語言統一問題，選擇了北京音。都跟他的理想方案有不遠的距離，但揆諸實際，也是非如此不可。更爲根本的漢字，作爲文化淵藪，數千年未曾改變，本也無改變的可能。但漢字常用字的設定也與太炎的希望相反，正是「漢字統一會」的主張。而二十世紀50年代大陸的漢字簡化，是爲拼音化做準備，其邏輯恰與《新世紀》一致。而直接造成與時間和空間，亦即與歷史和國土的書寫分裂，垂今已一甲子，正所謂聚九州鐵不足以鑄此大錯。不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這些選擇都木已成舟。但任何選擇遲早都會面臨問題，此時回頭去尋找曾經的異見，思考其邏輯，也許能成爲當下的資源。這正如草木可以燃燒，埋藏著的煤和石油同樣也可以燃燒。

（責任編輯：莊勝涵）

[151] 章炳麟：〈原學〉，《國故論衡》，下卷，頁147。

徵引書目

太　炎：〈演說錄〉，《民報》第6號，1906年7月25日。

太　炎：〈中華民國解〉，《民報》第15號，1907年7月5日。

太　炎：〈漢字統一會之荒陋〉，《民報》第17號，1907年10月25日。

太　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民報》第21號，1908年6月10日。

太　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1908年10月10日。

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王夫之：《周易外傳》，《船山全書》，湖南：嶽麓書社，1988年。

王夫之：《黃書・原極》，《船山全書》。

王　風：〈晚清拼音化與白話文催發的國語思潮〉，收於夏曉虹、王風等：《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王　風：〈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收於夏曉虹、王風等：《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

民　意：〈紀七月十五日歡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民報》第6號，1906年7月25日。

民　意：〈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民報》第10號，1906年12月20日。

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蹟筆記〉，《制言》第25期，「太炎先生紀念專號」，1936年9月16日。

西　狩：〈致□□二子書（癸卯四月）〉，《復報》第5期，1906年10月12日。

何冠彪：〈章炳麟與蔣良驥《東華錄》——歷史名人喜好誇大少年事迹一例〉，《明清人物與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年。

宗　仰：《齊物論釋・後序》，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六）。

段玉裁：〈說文解字敘注〉，《說文解字注》，〔清〕嘉慶二十年（1815）經韻樓刻本。

孫　文：〈發刊詞〉，《民報》第1號，1905年11月26日。

國學講習會發起人：〈國學講習會序〉，《民報》第7號，1906年9月5日。

曹世鉉：《清末民初無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章太炎：初刻本《訄書・訂文・正名略例》，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

章太炎：重訂本《訄書・序種姓上》，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

章太炎：重訂本《訄書・方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

章太炎：重訂本《訄書・訂文・正名雜義》，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

章太炎：《檢論・訂文》，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三）。

章太炎：〈答鐵錚〉（1906年11月15日），《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章太炎：〈丙午與劉光漢書〉，《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

章太炎：〈再與劉光漢書〉，《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

章太炎：〈代議然否論〉，《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

章太炎：〈救學弊論〉，《太炎文錄續編・卷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章太炎：《齊物論釋・釋篇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章太炎：《齊物論釋・釋第三章》，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六）。

章太炎：〈文始敘例〉，《文始》，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章太炎：《新方言・新方言序》，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

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收於章太炎撰，虞雲國校點：《菿漢三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年。

章太炎：〈致吳君遂書〉（1902 年 8 月 8 日），收於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

章太炎：〈菿漢微言〉，《菿漢三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年。

章太炎：〈獄中答新聞報〉，《蘇報》，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1903 年 7 月 6 日）。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章太炎：〈與孫詒讓〉，《制言》第 30 期，1936 年 12 月 1 日。

章太炎：〈與錢玄同〉（1907 年 8 月 18 日），收於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章太炎：〈與龔未生書〉，1914 年 5 月 23 日，收於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

章太炎：〈題所撰初印本《新方言》予黃侃〉，《雅言》第 6 期，「章太炎文錄（續）」，1914 年 3 月 10 日。

章太炎：《自定年譜》「清稿」本，「宣統二年四十三歲」條，《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上海：上海書店，1986 年。

章炳麟：《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大共和日報館，1912 年。

章炳麟：〈革命軍序〉，收於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章炳麟：〈文學說例〉，收於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

章炳麟：〈章太炎癸卯□中漫筆〉，《國粹學報》第 8 期，1905 年 9 月 18 日。

章炳麟：〈與鍾君論學書〉（1909 年 1 月 20 日），《文史》，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章炳麟：《國學講習會略說》，東京：秀光社，1906 年。

章　絳：〈諸子學略說〉，《國粹學報》第 20、21 期，1906 年 9 月 8 日、10 月 7 日。

章　絳：〈文學論略〉，《國粹學報》第 21、22、23 期，1906 年 10 月 7 日、11 月 6 日、12 月 5 日。

章　絳：〈論語言文字之學〉，《國粹學報》第 24、25 期，1907 年 1 月 4 日、2 月 2 日。

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號，1928 年 10 月，頁 4。

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漢字統一」與「萬國新語」——章太炎關於語言文字問題的論爭（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67-73。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無署名：〈國故論衡廣告〉，見 1910 年《教育今語雜誌》各期。

無署名：〈博徵海內方言告白〉，《民報》第 17 號以後各期。

無署名：〈新方言定本〉，《國粹學報》第 56 期，1909 年 8 月 5 日。

絳：〈通訊〉，《國粹學報》第 59 期，1909 年 11 月 2 日。

黃　侃：〈聲韻略說・論斯學大略〉，《黃侃論學雜著》，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4 年。

黃　侃：〈聲韻通例・附：與人論治小學書〉，《黃侃論學雜著》。

黃　侃：《新方言・後序二》，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

（七）。

黃季剛：〈太炎先生行事記〉，《神州叢報》第1卷第1冊，1913年8月1日。

黃錦樹：《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系譜》，永和：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

劉子駿之紹述者：〈某君與某書〉之二，《國粹學報》第24期，1907年1月4日。

劉光漢：《新方言・後序一》，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魯　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燃　料：〈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新世紀》第57號，1908年7月25日。

獨　角：〈社說〉，《教育今語雜誌》第1冊，1910年3月10日。

獨　角：〈論文字的通借〉，《教育今語雜誌》第4冊，1910年6月6日。

錢玄同：〈章太炎黃季剛二君關於劉申叔之文十首〉繫於己酉（1909），收於劉師培著，錢玄同主編：《劉申叔遺書》（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戴震著，湯志鈞校點：《戴震集・答江愼修先生論小學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羅志田：〈清季圍繞萬國新語的思想論爭〉，《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頁86-144。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羣、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龔翼星：《光復軍志》，1918年8月天津華新印刷局。